〈论文〉

对儿童施暴的历史语境与性别视角

——从战争体验世代之女儿（虐待当事者）的生命故事中思考

北村　毅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心理学、精神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日益表明，战争中的受害与加害体验会导致私人领域内暴力（如家庭暴力、虐待等）的增加。在「PTSD范式」 [宫地 2004: 8-9] 确立之前，创伤研究便以直接的创伤幸存者为核心展开，但经由「二次性创伤性压力」(STSD)这一概念 [斯塔姆编 2003] ，近二十余年间，学界开始将视野延伸至战争体验者家属所特有的派生性创伤。

其中，关于归还兵（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精神健康的研究尤为丰富。[1] 近年研究将退役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家属的影响概括为「二次创伤化」(secondary traumatisation)，并指出这种家属PTSD会损害子女的心理发展，有可能在后续世代中形成连锁反应 [Klaric et al. 2013] 。此外，针对非洲及中东等冲突地区的研究 [Catani et al. 2009; Olema et al. 2014; Saile et al., 2016] 表明，战争会增加不当养育(maltreatment)行为，对社区与家庭功能造成严重且持久的损害。

PTSD这一概念本就源于对越战归还兵的研究，由此可见创伤研究与战争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扬 2001] 。然而，正如奥莱马等人 [Olema et al. 2014] 所指出的，战争创伤相关研究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幸存者本人，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暴力不止于体验者本身、还会向后续世代持续渗透这一问题，即便从海外研究的潮流来看，也仍属次要议题。

在日本国内，试图在家族领域中发现战争精神后遗症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精神科医白川美也子基于自身临床经验写道：「在临床上，我常常感到，以战争受害幸存者——那些将自身所受苦痛加以解离、压抑的人——为源头，暴力的世代间连锁正在悄然发生」，然而在日本国内，这种问题意识并未在临床工作者中得到广泛共享，也未能作为临床课题被深入探讨。

在涉及家族与战争「内心问题」的先行研究中，野田 [1998] 首当其冲。野田在该书中追问元兵士的罪责感之所在，以两位战后出生的当事者的访谈为基础，分析了他们在元兵士父亲的沉默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其中一位受访者仓桥绫子后来也将自身经历整理成手记出版 [仓桥 2002] 。然而，此后直至从临床现场指出「体罚」与「战争」之关联的森田 [2019] 问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始终付之阙如。2019年，中村 [2019] 亦发表了一篇思考其祖父参与日中战争的体验与自身从父亲处所受「家父长式体罚」之关系的文章，将「家族史的创伤」与帝国日本的「殖民暴力」相勾连。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2015年11月，在日本创伤研究领域具有引领地位的心理学家森茂起的倡议下，日本儿童虐待防止学会举办了题为「战争体验与儿童虐待——从创伤的世代间连锁思考」的专题研讨会，笔者亦作为研讨嘉宾之一参与其中。四位嘉宾分别以「战争对育儿造成的创伤：问题领域概观」（森茂起）、「了解父亲的战场」（大森淳郎）、「父亲的战争体验与我的人生」（小林茂）、「关于战争与虐待的一点思考：

注1　已由福浦〔2019〕进行整理，请参阅该文。

从某家族的战后史说起」（笔者）为题发表演讲，并与在场听众展开了深入的讨论。[2]

1-2 研究目的

本稿承接上述研讨会所提出的问题，以亚洲·太平洋战争「战后」这一时间轴为框架，探讨在家族这一领域中，战争这一公共暴力与虐待这一私人暴力之间的关联。为此，本稿将以一位虐待当事者的生命故事为案例加以分析。

据日本生命故事研究领域的泰斗樱井厚所述，生命故事研究是一种「以个人迄今为止走过的整体或部分人生为焦点，整体性地从其自身经验中解读社会与文化的诸面相及其变动」的质性调查方法 [樱井 2002: 14] 。换言之，生命故事的倾听者需要解开「作为叙述者用以生存和据以诠释的装置，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地方文化等多重语境」的缠绕 [樱井 2005: 18] 。

本稿以某位虐待当事者的「自我叙述」 [小林·浅野编 2018] 为基础，旨在结合其与战争的关联，解读家族史的「多重语境」。之所以采用生命故事这一方法，是因为笔者认同丹尼尔·贝尔托所述——这一质性取向「对于从社会志视角理解置于社会语境与时代之中的家族形态与类型」是有效的 [贝尔托 2003: 69] 。

具体而言，本稿将以童年时代曾受日本陆军「参谋候补」父亲虐待的石山惠美女士（化名）的生命故事为案例，从性别视角检视其个人经历的意涵，并尝试厘清石山女士在家庭内所遭受暴力的历史与社会语境。

2. 虐待当事者的生命故事

2-1 关于叙述者

石山惠美女士，1954年生于兵库县，是活跃于京阪神一带的蓝调歌手。1978年，24岁的石山女士正式出道。出道曲在深夜广播等节目中得到播出，有线广播亦取得良好成绩，然而第二张单曲因以强奸为题材而被认定「过激」，遭到广播禁播。1981年，她在井上阳水的制作下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此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空白期，直至1993年方才复出。

以下所呈现的生命故事，以2015年11月3日在箕面市内进行的长达七个半小时的石山女士访谈录音为基础。访谈转录稿经与叙述者反复邮件沟通，对细节逐一核实后，方才整理成文。

2-2 父亲与战争

石山女士认为，她从父亲（1925年生）处所受的虐待与父亲的战争体验存在关联。以下先对石山女士父亲与战争的关系作一梳理。

石山女士的父亲自陆军幼年学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3] 走在陆军的精英晋升之路上，却在士官学校第59期在校期间迎来了战败。山崎编 [1969: 88] 将未能正式毕业的第59期与第60期记述为「承受了士官学校苦难最多的一届」。被训育了「作为肩负国军的指挥官之精神要素」的第59期生，在即将毕业之际便复员归乡，但被赋予旧专门学校毕业资格，得以获得入学大学的途径 [五九史编纂委员会编 1973: 2, 259] 。

战后，石山女士的父亲考入一所国立大学的法学部，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据石山女士所述，父亲本想成为检察官，但因担心共产党执政后对自己不利，「无奈之下做了律师」。

注2　本次研讨会的演讲记录，请参阅森他〔2016〕。

注3　据石山女士所述，父亲曾讲过自己考入了陆军大学校。石山女士父亲作为第59期生于1944年10月入校陆军士官学校，这一点已在士官学校「出身者一览」中得到确认 [山崎编 1969] ，但其就读陆军大学校的记录在名单中未能得到确认。或许是石山女士的记忆有误，但也不排除父亲向女儿夸大经历的可能性。

因战败而断绝了军官之路的父亲，始终自豪地向女儿讲述自己「跳级考入」陆军幼年学校的经历，并把「本该成为参谋」、「接受过统率几万兵士的训练」挂在嘴边。此外，他虽断片式、独白式地向家人讲述战争，表面上也说「战争不好」，但经常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语：「陆军被弄成了坏人」、「历史遭到了捏造」、「慰安妇是因为喜欢才干的」、「日教组是罪魁祸首」、「现在的年轻人会替我们挡子弹吗」。然而，这些不过是「犹如冰山一角般，结论突然冒出来」，完全无法形成对话——这正是石山女士父亲谈论战争的特点，其中浓厚地折射出战前、战时的价值观。

石山女士的父亲从五十多岁起饮酒量逐渐增加，某个时期已接近「酒精依赖」的状态，但醉酒后有时也会流露出相对接近真心话的一面。

例如，石山女士二十五六岁时，围绕父亲的饮酒，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是在老家的新年聚会上，当石山女士走进亲戚们聚集的房间时，父亲已然烂醉如泥。见女儿出现，父亲朝她做出「砰砰」射枪的动作，反复喊着「本来想杀中国人的」。石山女士一时不知所措，父亲却口中念叨着「朝鲜P」[4]走上前来，突然摸了她的下腹部，随即将手移至自己嘴边，说了声「啊，好吃」。石山女士形容这次经历「甚至记不清自己怎么回家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

石山女士从十多岁起便曾多次遭父亲面不改色地重击心窝等部位，但次数并不频繁，且此前从未有过如此露骨的性暴力，因此这次格外令她震惊。

这一事件成为契机，石山女士开始产生一种疑念：自己在家中是否一直被当作「慰安妇」来对待。

2-3 虐待环境的形成

在那次事件之前，来自父亲如此露骨的性暴力尚不存在，但石山女士在十几岁时，已深受来自兄长的身体暴力与性暴力之苦。石山女士在小学六年级时，突然开始遭到大两岁、当时就读初中二年级的兄长殴打。石山女士喜爱读书，每当她在读书时，兄长便以「女人凭什么」为由出手打她；她反问为何挨打，兄长却回答「因为你是女的」。

然而，石山女士在起居室被兄长踹中心窝或遭其骑压施暴等情形，父亲、母亲乃至同住的父方祖母皆视若无睹。据石山女士所述，无论她如何向家人哀求「让他住手」，都无人理会，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打我」的氛围，祖母甚至落井下石地责骂道：「女人家惹怒了长男，错的是你」。

正如精神科医朱迪丝·L·赫尔曼 [1999: 155] 所述，遭受虐待的孩子在「自己亲密世界中权力最强的成人不仅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且本应负有照护责任的其他成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处境下，被逐渐与其他家庭成员隔绝。石山女士同样被置于家族内孤立无援的境地。

成绩优秀的兄长在初中一年级之前被当地重点中学的人称为「神童」，父亲也寄望他考入东大，然而进入初中二年级后，他的成绩突然一落千丈，跌至倒数。家中由父亲实施完全的「信息管控」，石山女士当时并不知晓这一事实，但时间上与兄长开始殴打她的时期相吻合。

由于兄长暴力实在过激，石山女士曾一度穿着睡衣逃进附近的警察署，却被认定为「兄妹打架」而被送了回来。

石山女士升入初中后，兄长的暴力进一步升级，并开始带有更浓厚的性因素。每天几乎都要经历被兄长骑压在身，在揉捏胸部的同时听着「怎么样，女人」这句话的暴力。对于兄长当时的意图，石山女士这样说道：

注4　陆军士官学校有一种隐语，将「艺伎」称为「S」，将「游女」（慰安妇）称为「P」。「也有说法是模仿逻辑学，称所有S皆为P」 [山崎编 1969: 27, 124] 。

　　我想那主要是为了给我屈辱感吧。意思大概是「女人就该是这样」，或者「敢读书的女人就该受这种罪」。

暴力往往「刻意」在家人团聚时发生，而家人却只是旁观。石山女士这样描述那种情形：

　　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就是毫无人情味，没有血没有泪。我想兄长是明显地在父母面前展示给他们看的。那样做得分更高，或者说那样做是父母最心安理得的事，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另一方面，兄长的暴力对象似乎从未指向其他家庭成员。据石山女士所述，「我成为祭品，也就有了让全家凝聚、圆满的意义」。

兄妹之间还存在极端的差别对待。石山女士以「对我是虐待，对兄长是溺爱」这样印象深刻的说法加以表达——父母对身为长男的兄长，是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而对妹妹石山女士，则以「家里没钱」为由，连她喜爱的书也不轻易购买。

不过，石山女士的兄长尽管买了昂贵的模型玩具和电吉他，却常常很快厌倦、中途放弃。高档音响和唱片也随意买了个够，但他复读后离家时，全部抛下不管。石山女士说，从那套音响里听到的音乐，成就了她今天的事业——「因为觉得可惜而摆弄那把二手吉他，才有了今天」。

石山女士从未见过兄长在家里被责骂，父母对长男完全放任，对其问题行为不予斥责，家中也从未有过任何针对兄长的负面言论。

后来，石山女士从熟人口中得知，兄长曾因在学校「欺凌弱小」而受到关注，家长被叫到学校，但父亲却向老师「反向爆发」，坚称「我儿子没有错」。石山女士评价说「可以说是如今的怪物家长的先驱」，可以认为，对兄长而言，虐待环境是以与石山女士截然相反的形式形成的。

2-4 战争与虐待的衔接

石山女士18岁考入当地大学，在校期间开始从事音乐活动。23岁左右，她在弹吉他时，歌词和旋律突然迸发而出，那首曲子便是「厕所的蓝调」。从那以后，她开始自己作词作曲，24岁时以「清晨醒来……」这首歌正式出道。

《厕所的蓝调》受到同时代女权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女人是厕所，男人的厕所」这句话，将男性普遍对女性的歧视意识和特权意识问题化。据石山女士回顾，如今看来，那首歌「想说的是，我这个人在家里就是那个厕所」，但当时「套上了女权运动的滤镜」。

石山女士逐渐意识到，自己曾是家族的「厕所＝泄愤工具」。她说：「家里除了兄长的学业之外，还有婆媳矛盾等诸多摩擦因素，但我成为共同的敌人，反而凝聚了大家，让家里得以平和相处。」这正是一种以某人的牺牲维持平衡的秩序。

渐渐地，石山女士开始将家族关系中潜藏的问题置于父亲战争体验的延长线上来理解。以下直接引用石山女士的原话：

　　父亲溺爱兄长的背后，我觉得也有「必须让他考上东大」这方面的原因。父亲在家中总是以参谋的姿态自居，其中也有一种调动参谋式兵士的思维吧。当时有「升学战争」这个说法，为了让兄长作为士兵打赢升学战争，就必须给他配一个充当泄愤工具的慰安妇。父母想，让他去打妹妹，或许他的心情就能振作起来，重新燃起学习的劲头——这种想法肯定占了很大比重。我觉得，兄长能考上一流大学、进入大公司，是因为我持续扮演了慰安妇的角色。总算把他送进了社会成为企业战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的战略是正确的。

对石山女士而言，直面自身虐待记忆，与批判性地检视父亲的战争观和性别观，是相互贯通的。

> 父亲好像总是遗憾自己未能以参谋身份与中国作战。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是在家里推行着某种虚拟战争。参谋是父亲，兄长是士兵，我是慰安妇——父亲是把自己的家全力以赴地变成了战场吧。

如前所述，石山女士二十五六岁时，曾发生了被父亲以「朝鲜P」称呼并触摸下腹部的事件，此后她开始在自己与「慰安妇」之间发现一种类比关系。

> 我开始认为，作为最弱小女孩的我，被迫承担了殖民地、慰安所的角色。就像为了鼓舞士气而制造了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存在，父亲也把这种思维带进了家里——日本军队对朝鲜慰安妇所做的事，与父亲在家里所做的事，重叠在了一起。

此外，随着表现活动的深入，石山女士开始意识到自身所受虐待与对亚洲侵略之间的对应关系。

> 我是一个可以随意侵略的对象。我想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意图，才给我起了○○○（石山女士本名）这个名字。父亲告诉我，我的名字源于万里长城，我想父亲有想侵略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中国却未能如愿的遗恨，便把我这个存在作为侵略的替代物。这种心情在亲戚聚会时「本来想杀中国人的」那句话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近年来，石山女士以「虐待幸存者」的身份投身表现活动，持续演唱那些以自嘲方式直面虐待记忆的蓝调歌曲。其中有一首名为「虐待……生存·布吉」的曲子，歌唱着她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歌词参见下节）。

这首歌以石山女士4岁时，穿着七五三节的和服兴高采烈之际，父亲突然冷冷地说出「所以我讨厌女人」，令她深受伤害的体验为基础。这种「年幼时便被刺穿胸口的体验」，使石山女士意识到，在父亲眼里，自己是「100%令人厌恶的存在」。此后，「谄媚男性的丑陋姿态」成为她的自我形象；然而长大后重看当时的纪念照片，却不过是「一个孩子在笑」，反而令她感到惊愕。

2010年前后，石山女士将这些经历谱成歌曲，那时她已年过50。她足足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终于能够将与父亲的关系唱成歌」。

3. 考察

3-1 家庭这个战场

上一节石山女士的生命故事，为我们在同一维度上审视侵略（战争）这一公共暴力与虐待这一私人暴力提供了启示。石山女士「父亲是否将我这个存在作为侵略的替代物」这一叙述，是对侵略与虐待同样处于容认强者滥用弱者的同一结构之下这一认识的呈现。以下，通过同时把握侵略这一集体层面的压迫状况与虐待这一个人层面的压迫状况，来思考加害与被害的相互作用、性别特性，以及暴力连锁的意涵。

战前战中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家父长制的制度与价值观——即容认强者滥用弱者的体系——并未随战败与战后民主化而崩溃。石山女士父亲「本来想杀中国人」这句话，处于战前战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的延长线上。这种思想与表面上的战后民主主义相悖，于是向家庭内部潜入（内化）。

石山女士父亲思想基础的形成，可以想象与从幼年学校至士官学校的教育密切相关。在战后28年编纂的第59期纪念志中，编者写道：「确信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伟大教育」，这种对自身所受教育的自负，绝不仅限于该编者一人 [五九史编纂委员会编 1973: 2] 。

石山女士敏锐地感受到了父亲内外的落差（分裂）。以下引用石山女士的话：

> 「父亲在外面不得不保持『我是律师』的面孔。说真心话的地方，只有家里。」
> 「如果是一看就懂的军国主义者，那还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他，但平时几乎看不出那一面来。若是如此我也会好过一些，可他是在伪装，只能看作是在适应战后社会。但不经意间那一面就会流露出来。」

重要的是，石山女士的父亲尽管内怀这种分裂，表面上却俨然适应了战后社会。

在美国，越战之后，携带着PTSD等后遗症的归还兵成为重大社会问题。许多归还兵深陷噩梦、闪回、酒精依赖之苦，无法抑制愤怒与暴力冲动，在家庭关系上引发种种麻烦，这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认为，在日本的战后，同样有大量无法适应战后社会的军队经验者存在。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关注过度适应战后社会的军队经验者的案例。战后，在那些以企业战士等身份投身经济战争的人群中，不乏像石山女士父亲这样，将军国主义逻辑内化、在家庭内部反复强者滥用弱者体系的人。

其中，有人怀抱战争的创伤性记忆，却将其压抑着。森茂起 [2005: 236] 所指出的「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本身，也可以说是在回避直面战争创伤的尝试中发生的」，是一个重要的论断。此外，野田正彰 [1998] 指出，这种元兵士过度适应战后社会的背后，存在着拒绝察觉自身心灵创伤的内心问题（「情感麻痹」）。

基于石山女士的生命故事，可以认为，她的父亲通过将家庭军事化、殖民地化，试图替代性地消解未能出征实战的自卑感以及战后社会中无法满足的欲望。

石山女士证言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句话：「（父亲）是以一个人能否适应支配他人、在战争中杀人来评判对方的。」此外，以下证言也是了解其内心的重要线索：

> 在我感受中，对父亲而言，战后这个和平时代是谎言的时代，是一种暂时的姿态。价值观突然改变，这不对，我受到了不当对待——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受害者意识的化身。

这种「受害者意识」的底部，积压着因战败而断绝了精英军人前途、在战后社会主流派的「反军氛围」[吉田 2005: 91] 中漂泊的那个战后时代所带来的不满与怨恨。抱有同类「受害者意识」的军队经验者并不在少数，在他们心中，战争尚未结束。在这样的人当中，不乏将家庭军事化，将孩子如同士兵或「慰安妇」般对待，延续着石山女士所说的「虚拟战争」者。

3-2 被性别化的牺牲者

关于家庭内部的这种军事化，我们再从性别视角作进一步考察。值得关注的，第一是石山女士所说的「虚拟战争」的战场被性别化了这一事实；第二是这场战争在女性这一「最后的殖民地」 [格鲁 1979] 上展开。

贝蒂·里尔顿在《性别主义与战争体系》中论述道，在「战争体系」与「性别主义」的勾结之下，「男性被社会化为扮演敌方或侵略者角色的战士，女性则被社会化为成为受害者或替代性敌人」。石山女士父亲对女儿与儿子的支配形态显然不同，石山女士作为女性理想型（暴力的客体），被父亲要求「顺从、依赖【男性】，而非主张与独立」，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里尔顿所言，「家父长制依赖于女性的脆弱性」，且「战争体系繁殖女性的脆弱性」 [里尔顿 1988: 68, 76, 82] 。

这种以「女性的脆弱性」为前提、需要以受害者身份存在的女性的结构，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家族关系中都是相通的。石山女士以「厕所＝泄愤工具」这个词，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种社会性建构的弱者——女性——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的位置。换言之，牺牲者，始终是事先被性别化的。这与日本军士兵将「慰安妇」称为「公共厕所」、进驻军士兵将同类存在称为「黄色马桶座」加以蔑视，却将她们的身体作为「必要之恶」的「物件」加以消费，形成了深刻的重叠关系 [田中 2008: 95] 。

换言之，从支配者——男性——一方面被「女人，所以讨厌」的厌女情绪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将「朝鲜P」（慰安妇）这一牺牲者的存在视为不可或缺的矛盾（依赖）中，可以窥见家父长制的本质。在这种依赖性心理的基础上，战时暴力与家庭暴力得以成立。

在这种从男性到男性代代相传的同性社会性体系的延长线上，也可以理解被父亲作为「士兵」（暴力的主体）训育的兄长的攻击性。石山女士的兄长通过「溺爱」同样是被滥用的受害者，但正因如此，兄长成为

对妹妹施加暴力的加害者，这便是虐待的连锁。换言之，通过析出石山女士及其兄长所置身的那种养育环境所特有的性别差配，应能厘清男性的厌女情绪与攻击性得以成立的背景。

石山女士说：「我既是被杀的中国人，也是被强奸的慰安妇。我是一个可以随意侵略的对象。因为是在家里的密室里做的事，没有人会追究。」对石山女士所受的这种暴力，也可以用「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Wies and Haldane 2011] 来加以把握。

如前所述，石山女士2011年发行的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以轻快节奏歌唱父母虐待经历的「虐待……生存·布吉」，以下引用其部分歌词：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布吉的节奏里　生存　布吉乌吉

生下来第一个遇到的人　是疯子
未出生就陪伴在身边的　是疯子
最亲近的老祖宗　是疯子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是你们的祭品

ル、规矩没有　モ、道德也没有
ハ、没有心脏　NO NO NO　没有同情
还不得不和这种人好好相处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虐待妈妈　虐待爸爸
布吉的节奏里　生存　布吉乌吉

穿着七五三的和服雀跃时
爸爸说：「所以我讨厌女人」　唉——
那是我能记得的　关于爸爸最久远的记忆
虐待爸爸　虐待爸爸　虐待爸爸　虐待爸爸
4岁时　明明白白被说了「讨厌」

逃、逃不掉　意、意义不明
禁、被禁锢着　自己的家是强制收容所
从出生就一直　固体处境恐怖片

石山女士就这样认识到自身所受教育是一种虐待，并通过察觉虐待与侵略的对应关系，重新找回了自身的主体性，迈出了作为暴力幸存者的第一步。

樱井 [2002: 23] 写道：「从属的、受压迫的人们的生命故事，是其经验的表达，不仅赋予自身所处社会世界以意义，阐明种种问题，还能促进自我理解，助益于创造自身的生活方式。（略）它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基本工具。」正可谓，石山女士通过生命故事获得的自我觉察，不仅限于个人的解放，也具有成为「社会变革」之一助的力量。

4. 结语

以上，基于石山女士的生命故事，考察了战争这一公共暴力与虐待这一私人暴力之间的关系。其「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 [范·马南 2011] 所指向的，是这样一个现实：在强者滥用弱者的社会结构导致战争发生、而战争又再生产强者滥用弱者的社会结构的恶性循环中，儿童与女性成为暴力最大的受害者。

关于那些受害者中压倒性多数为女性、且集中于年轻世代这一性别的、世代的失衡问题，正如詹姆斯·吉利根 [2010] 和森田由里 [2019] 等人所论述的那样。吉利根援引「战争是年长者对年轻囚虏【＝年轻世代】的复仇」这一说法，指出「无论是父母对自己孩子施暴的形式，还是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将年轻人送上死路的形式，无休止的暴力恶性循环（略）在一代又一代间周而复始」 [吉利根 2010: 85] 。通过梳理当事者的生命故事，将这种家庭内部的「恶性循环」可视化，即便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终结75年后的今日，也依然是社会临床上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在这种社会结构上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可以发现约翰·加尔通 [1991] 所说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最后，作为今后的探讨课题，笔者想提出对家族内暴力加害者一侧的研究取向。将虐待、侵略等暴力正当化并加以实施的心理，往往被表述为意识形态问题，在开篇所记「PTSD范式」的脉络下，亦被排除于病理的范畴之外，只要其未表现为反社会行为，便被置于临床问题的射程之外。要深入探讨这种加害者心理的形成机制，本稿从受害者一侧切入的方法存在局限，但今后将加害者研究纳入视野，探讨以「受害者意识」为表现形式的他们的加害者性与受害者性之交错，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引用・参考文献

贝尔托，丹尼尔，2003，小林多寿子译，《生命故事：民族社会学视角》，矿泉书房

Catani C., et al., 2009, War trauma, child labor, and family violence: life adversities and PTSD in a sample of school children in Kabul,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2(3), pp.163-171.

福浦厚子，2019，「战斗压力的形态：从炮弹休克到二次创伤」（田中雅一·松岛健编）《共享创伤（创伤研究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加尔通，约翰，1991，高柳先男他译，《结构性暴力与和平》，中央大学出版部

吉利根，詹姆斯，2011，佐藤和夫译，《男人为何施暴：其机制与预防》，大月书店

五九史编纂委员会编，1973，《望台：陆军士官学校第五十九期生史》，五九会

格鲁，布诺瓦特，1979，有吉佐和子他译，《最后的殖民地》，新潮社

赫尔曼，朱迪丝·L，1999，中井久夫译，《心理创伤与康复〈增补版〉》，御茶水书房

Klaric M., et al., 2013, Secondary traumatisation and systemic traumatic stress, Psychiatria Danubina, 25, Supplement 1, pp.29-36.

小林多寿子·浅野智彦编，2018，《自我叙述的社会学：生命故事·问题经验·当事者研究》，新曜社

仓桥绫子，2002，《⊠兵父亲留下的遗产：父女两代，凝视心灵创伤之旅》，高文研

宫地尚子，2004，「总论：创伤与性别如何相互联结」（宫地尚子编）《创伤与性别》，金刚出版

森田由里，2019，《体罚与战争：人类的两大不名誉传统》，鸭川出版

森茂起，2005，「认同攻击者与创伤连锁」（森茂起编）《埋葬与亡灵：创伤概念的再审视》，人文书院

森茂起他，2016，「战争体验与儿童虐待：从创伤的世代间连锁思考」《儿童虐待与忽视》第18卷第2号，儿童虐待防止学会

中村平，2019，「家族-国家日本的殖民暴力与创伤：去殖民化与」不再是他人之事「」（田中雅一·松岛健编）《共享创伤（创伤研究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野田正彰，1998，《战争与罪责》，岩波书店

Olema, D. K., et al., 2014, The Hidden Effects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a War Region: Correlates of Psychopathology in Two Generations Living in Northern Ugand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7(1), pp.35-41.

里尔顿，贝蒂，1988，山下史译，《性别主义与战争体系》，劲草书房

Saile R., et al., 2016, Children of the postwar years: A two-generational multilevel risk assessment of child psychopathology in northern Uganda,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8(2), pp.607-620.

樱井厚，2002，《访谈的社会学：生命故事的倾听方式》，Serika书房

白川美也子，2005，「历史、创伤与解离」（森茂起编）《埋葬与亡灵：创伤概念的再审视》，人文书院

斯塔姆，B.H.（编），2003，小西圣子他译，《二次性创伤性压力：临床工作者、研究者、教育者的自我照护问题》，

诚信书房

田中利幸，2008，「国家与战时性暴力及男性气质：以」慰安妇制度「为线索」（宫地尚子编）《性支配与历史》，大月书店

范·马南，马克斯，2011，村井尚子译，《生活经验的探究：人文科学开启的富有感受性的「教育」世界》，Yumiru出版

Wies, Jennifer R. and Hillary J. Haldane, 2011, Ethnographic Not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Anthropology at the Front Lin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Jennifer R. Wies and Hillary J. Haldane eds.,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pp.1-17.

山崎正男编，1969，《陆军士官学校》，秋元书房

吉田裕，2005，「战争责任论的现状」（成田龙一他编）《为何是现在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岩波书店

扬，艾伦，2001，中井久夫他共译，《PTSD的医疗人类学》，御茶水书房

（北村　毅）